

花蓮文學的邊界

——論花蓮文學的定義與花蓮文學史撰述的困境

黃憲作

大漢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

摘要

1990年代因為鄉土意識的蓬勃發展，在政府政策引導下，九〇年代中期眾多區域文學史發表可視為鄉土意識發展的高潮。花蓮在這一波熱潮下也曾經進行花蓮文學史料的蒐集，做為「花蓮文學史」撰述的準備工作。雖然這次的蒐集工作在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部分大有收穫，但是「花蓮文學史」至今始終沒有出現。不過隨後地方政府舉辦了「花蓮文學研討會」、「花蓮文學獎」徵文，試圖擴充花蓮文學的內涵與凝聚共識，這些努力都有助於日後「花蓮文學史」的撰述。

為促使「花蓮文學史」早日誕生，本文試圖釐清花蓮文學的定義與其撰述的困難，因此有必要重新探討區域文學與區域文學史的相關論述。關於區域對於區域文學的影響是否必然存在，是探討區域文學必須先釐清的概念。從區域的劃分到區域的特色以及區域文化的生成，這才是影響區域文學的關鍵，釐清這些觀念之後才能試圖為花蓮文學下定義，花蓮文學的定義清楚之後，才能決定花蓮文學史的內容。最後，仍然有些模糊地帶在花蓮文學史撰述時會碰上的難題，如日治時期花蓮的文學書寫大多為日文，增加史料蒐集的難度，而花蓮人口的流動性強，客居的文人作家和旅行文學的書寫不知凡幾，其作品的認定問題仍然是個難題。最後是當今全球化的影響下，地方性與地方文學是否還存在，或是強調地方性與地方文學的意義何在？這都是撰述花蓮文學史需要克服的難題。

關鍵詞：花蓮文學、花蓮文學史、區域文學、地誌書寫、地方感

The Border of Hualien Literature:

On the Definition of Hualien Literature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Composing History of Hualien Literature

Huang Hsien-Tso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Da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e 1990s, the boosting homeland consciousness and the guidanc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spurred a great number of region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The period of mid 90s is regarded to be the peak of homeland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 With this trend, Hualien started collecting its historical documents for the preparation of composing “the history of Hualien literature”. It has made a great process in the collection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However, “the history of Hualien literature” hasn’t published yet. Later on, Hualien government held several events such as “Hualien Literature Seminar” and the writing contest for “History of Hualien Literature Award” in order to expand the contents and establish a mutual understanding of Hualien literature. All the efforts that have been made will help the composition work of “History of Hualien Literature” in the future.

“Do regions exactly have influence on regional literature?” That’s the concept which has to be clarified before the discussion of regional literature. The region’s division, features, and culture formation are exactly the key elements that influence regional literature. We can try to define Hualien literature only when all of the key elements are clarified. We can therefore decide the contents of the history of Hualien literature only when the definition of Hualien literature is clarifi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gray zone that exists in Hualien literature makes it difficult to compose the history of Hualien

literature; for example, during Japanese occupation, most of the literature was written in Japanese, which has made the collection of history documents more difficult. In addition, the frequent migrating guest writers and travelers in Hualien have created numerous but unknown literary works,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which is also a difficulty to deal with. Moreove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the doubt about the existence of local and regional literature, and the question about the value of local and regional literature are also the difficulties that have to be overcome.

Keywords: Hualien Literature, History of Hualien Literature, Regional Literature, Writing Topography, Sense of Place



花蓮文學的邊界

——論花蓮文學的定義與花蓮文學史撰述的困境

一、最被期待的區域文學：花蓮文學史料蒐集與後續發展

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雖然最後演變為政治動員，終究不能壓抑鄉土意識的勃發，解嚴之後，本土化已經成為不可扼之勢。1990年代，由於政府文藝政策的導引與鄉土意識的成熟，區域文學史終於水到渠成，1995年由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合著的《台中縣文學發展史》拔得頭籌，接著1997年施懿琳、楊翠合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次之，1998年江寶釵著《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1999年陳明台著《台中市文學史初編》、2000年莫渝、王幼華合著《苗栗縣文學史》接連誕生，稍後2006年龔顯宗撰《台南縣文學史上編》、2008年彭瑞金撰《高雄市文學史》、游建興撰《清代噶瑪蘭文學發展史》、2009年李瑞騰等人撰《南投縣文學發展史上卷》、2010年陳清松撰《基隆古典文學史》、2011年李瑞騰等人撰《南投縣文學發展史下卷》，區域文學史的撰述可謂遍地繁花。這股區域文學史熱潮必須回溯到1990年12月至1992年2月由《文訊》雜誌社所做的「十六縣市藝文環境調查」，接著在1993年4至6月由文建會主導、《文訊》雜誌社承辦的「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進行學術論辯與意見交流。該會議從東部開始，以順時針方向環島，陸續舉辦花東、高屏澎、雲嘉南、中彰投、桃竹苗、北基宜地區六場文學研討會，研討會論文與座談會實況集結為《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一書，李瑞騰在該書的〈序〉中指出：

這個構想是在各縣市藝文環境的調查之後形成的，可以說是前一個計劃的深化，和各縣市在文建會指導下進行縣市籍作家資料的建檔，以及有計劃的出版作家作品集相互呼應。我們認為唯有把現象鋪陳開來，把問題找出來，以有效的公開說明之方式來進行學術論辯，才有可能進一步

建立各地脈絡清楚的文學傳統。¹

在研討會後，各縣市紛紛提出調查研究計劃，做出更在地、細膩的田野調查，以作為區域文學史撰述工作的準備。花蓮縣立文化中心於1995年邀請顏崑陽教授主持《花蓮縣文學史資料蒐集整編與撰述計劃》，時程為1996-1997年，顏崑陽教授指出其目的：

這項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擬對本縣文學發展概況進行歷時性與全面性之史料蒐集整編，以作為撰述「花蓮文學發展史」的依據；如此，一則保存本縣區域文學之史蹟；二則鑑往以知來，由於系統而深入地瞭解文學發展之現象與規律，可做為本縣今後長期推展文學活動之指標。²

這項計畫是在文建會主導的「加強地方文化藝術發展計劃」之下，由縣政府提出的「地方藝文資料蒐集計劃」，全面性地針對藝術（繪畫、書法、雕塑、攝影、舞蹈、原住民藝術）、民俗（主要為漢人公眾祭祀空間）、文學等藝文資料與史料進行普查。³也就是說，這個計畫是在一個更全面、更宏觀的地方史料的蒐集與建構之下，關於文學活動、史跡的資料蒐集，以期待完成一部有史觀、有架構的「花蓮文學發展史」的撰述。這次的蒐集工作在傳統文學與現代文學部分大有收獲，但是各族口傳民間文學蒐集所得有限以及日治時期的日人文學則付之闕如，尚待來者努力。雖然「花蓮文學史」的撰述工作因為某些困難被擱置，看到各區域文學史的撰述成果紛陳，因此「花蓮文學史」的出現就更加令人期待。

王文進認為，在本土化浪潮風起雲湧之際，各縣市紛紛標榜各地域名稱的文學，例如：台北文學、府城文學、彰化文學、南投文學等，但是似乎只有

1 文訊雜誌社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94.03），頁2-3。

2 顏崑陽，〈等待「花蓮」文學史——花蓮文學史資料蒐編始末〉，《花蓮文化》45-46期（合集）（1997.12），頁27。

3 同註2。

「花蓮文學」最讓人覺得順理成章，因為「花蓮文學」的場域，既有其獨特性，又有其包容性，不但擁有眾多「隸籍」本地的作家，像楊牧、王禎和、陳黎、林宜滙、陳克華……等人，還有許多「客居」於此的作家，如陳列、林蒼鬱、孟東籬等人。他們的作品豐富了花蓮文學的意涵，而且使得花蓮成為許多人嚮往的文學國度與東方淨土，因此，「花蓮文學史」的撰述是最令人期待的。⁴

雖然花蓮文學史的撰述暫時受挫，花蓮縣立文化中心卻在1997年舉辦了全台第一場令人矚目的「花蓮文學研討會」，陳萬益認為，區域文學史在處理「區域文化特性如何內化為文學經驗題材、主題類型及語言風格，因而營造出與其他區域不同性質的文學」，⁵仍然力有未逮，那麼，「或許，一如花蓮區域文學會議的舉行，完全針對同一作家作品的討論，以區別彼此間之同質性、異質性，或相互問題材、主題、語言之連帶關係，逐漸可以凸顯區域文學的特色，這才是比較可以期待的方式。」⁶，看來，在「花蓮文學史」誕生之前，先舉辦「花蓮文學研討會」是一個受到肯定的方式，但是「花蓮文學研討會」的舉辦也非一帆風順，自第一屆「發現花蓮文學」（1997年）、第二屆「地誌書寫與城鄉想像」（1999年）舉辦之後，因為缺乏經費，延宕至2005年才有第三屆「在地與遷移」的舉辦，此後依循每兩年一次的規律接續舉辦了第四屆「區域·語言·多元書寫」（2007）、第五屆「地方感·全球觀」（2009年）、第六屆「溯源與奔流——花蓮文學百年」（2011年），至此，花蓮文學研討會又停辦了。

這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每屆都有一個主題，第一屆名為「發現花蓮文學」，實則是因為全台首創，在無所參酌典範的情況下，頗有嘗試精神，鄭樹森的專題演講拈出「地域色彩」與「地方文學」的相關性為花蓮文學定調，陳

4 王文進，〈花蓮文學與花蓮作家〉，《東海岸評論》131期（1999.06），頁56。事實上在王文進書寫本文前後，因為東華大學的設立等因素，又湧進了一批新的作家，包括王文進本人與李永平、顏崑陽、吳明益、郝譽翔……等人，但是林蒼鬱、孟東籬、王浩威等人則離開了。

5 顏崑陽，〈講評〈台北：一個文學中心的形成〉〉，文訊雜誌社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頁399。

6 陳萬益，〈現階段區域文學史撰述的意義和問題〉，《文訊》174期（2000.04），頁36。

黎則以「想像花蓮」指出花蓮市作家密度之高為全台僅見，花蓮文學的精神在實存的地理空間與虛構的文學想像間的融合，具有高度的象徵意涵。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在吳潛誠教授提出「地誌書寫」的理論指導下，為花蓮文學的差異性與多元性格找到詮釋進路，在往後的花蓮文學研究中，地誌書寫成為重要的理論依據。第三屆的「在地與遷移」則注意到花蓮作家的身分，有土生土長的在地作家與暫時移居的客居者或長期定居的移入者，梳理不同身分性質作家的花蓮書寫，發現花蓮文學的多元性。第四屆花蓮文學研討會指出花蓮文學的區域特性與種族、語言有關，古典文學、客語、閩南語、原住民語的交雜混聲，形成的多元書寫，是花蓮文學的特色之一。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則有感於全球化的威脅之下，全世界已經扁平化成為「地球村」，地方差異是否已經遭到消除，那麼地方文學的意義何在？第六屆在花蓮文學百年之際，企圖辨識源流並指出當下文學發展的現況，回歸到文學史重要元素——時間，強調日治時期文學與原住民文學的文學源流，並且連結區域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在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時即已經注意到日治時期的花蓮書寫，至此更深化了日人文學的挖掘工作，這方面的努力很有意義，彰顯出花蓮文學與台灣其他地區的差異與獨特性。

六屆十餘年來的花蓮文學研討會，累積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開拓了花蓮文學的論述，但是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停辦的原因是討論的作家重複性高，顯現了文本不足的窘境。因此花蓮縣文化局試圖以寫作計畫培植在地作家，豐富文學文本，以文建會（當時尚未升格文化部）經費補助的「101年花蓮縣作家在地寫作計畫」取代現有的文學研討會形式。本計畫邀請五位花蓮作家：黃憲作、王威智、赫格、阿道·巴辣夫、廖律清，分別從自然、史地、產業、族群、海洋五種面向觀看、書寫花蓮，展現花蓮作家對族群、自然、文化歷史及生活方式的關注與思考，創造多面向的花蓮文學文本，企圖從文學角度驗證「全球在地化」的可能。⁷在計畫執行期間廖律清小姐不幸辭世，改由邱上林

7 花蓮縣文化局，〈101年花蓮縣作家在地寫作計畫——五種觀看花蓮的方式企畫書〉，內部文件（未公開）。

「空中看花蓮寫花蓮」之寫作計畫遞補，於2013年11月出版五本著作：黃憲作《鯉魚潭自然誌》、王威智《地圖繪製學》、赫恪《甘蔗的名字》、阿道·巴辣夫《路·Lalan》、邱上林《大地之上》，五種著作的內容能否擴大花蓮文學的邊界尚有待檢驗，但是這樣的計畫必須持續，才能厚實花蓮文學文本。事實上花蓮縣文化局與本地作家的互動，最常見的方式就是透過補助出版獎勵當地作家創作，出版洄瀾藝文叢書已行之有年，但是補助的範圍也及於繪畫、書法、攝影等，文學書寫只占其中一部分，涓涓之流或許無法匯聚成大河，滴水穿石之功或不容小覷。

台南縣立文化中心於1993年創辦「南瀛文學獎」為地方文學獎之開端，地方文學獎以發揚當地民情風俗特色、鼓勵當地民眾寫作的徵文形式，為各地文化局沿用。花蓮文學獎遲至1999年始開辦，之後停頓數年，至2002年復辦至今。花蓮文學獎創辦時有兩大特色，一是不限定參賽者資格，二是不限定書寫主題必須與花蓮有關。各縣市文學獎大多有限定戶籍為當地或是在該地就學、就業、居住之事實，花蓮文學獎完全不設限的原因，顏崑陽說：

花蓮人開辦的文學獎，眼界並沒有被中央山脈阻擋住；我們前瞻性地看到整個台灣文學的全景。因此，出錢的人並不拿「花蓮」去綁住作者的筆桿，寫什麼都可以，只要真心的創造。

在文學的世界中，「區域文化意識」絕不可以誤作「畫地自限」的心靈牢獄。在山風海雨之間坐臥行止的花蓮人，當然會有其他區域的人們所不曾經歷的觀想。這樣特殊的自然與人文環境經驗，讓花蓮人能別具心眼去看待世界，而「花蓮」也就成其為「花蓮」，無可取代了。但是一切「文學」儘管都以「特殊」為始，卻又必須以「普遍」為終。⁸

從顏崑陽的宣示可知花蓮人大器不綁住寫作者的筆，期望可以擴大參與，豐富花蓮文學的內涵，因此在參賽資格上並不作限制。第一屆花蓮文學徵文

8 顏崑陽，〈找尋對人性的關懷與書寫〉，花蓮縣立文化中心編，《第一屆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1999.06），頁149。

除了特別獎限定主題必須與花蓮有關之外，其他文類並無任何限制，因為他們體認到花蓮文學不能畫地自限，有信心以花蓮特殊的自然景觀與人文環境，自然能夠陶育出無可取代的花蓮心眼，或吸引外縣市的人書寫出特殊性與普遍性兼具的花蓮文學。但是花蓮文學獎自第一屆舉辦之後停辦數年，至2002年始恢復花蓮文學獎徵文，採取「花蓮文學特別獎」的模式，標舉出與花蓮相關的主題，以下為各屆的主題：2002「花蓮詩路」、2003「愛上花蓮的理由」、2004「花蓮故事」、2005「書寫花蓮」、2006「給花蓮的戀人絮語」、2007「生活在花蓮」、2008「想像花蓮」、2009「深情花蓮」、2010「花蓮紀念照」，2011-12年又改為不限主題的徵文方式，2013年又恢復主題徵文：「行走花蓮」。另外，從2008年開始設有新人組，鼓勵高中以下學生創作，培育在地寫作新秀的用心值得注意，2011年開始增設「書寫原住民」類，意欲凸顯花蓮原住民較其他縣市為多的特色，2012年增加「花蓮食記」類，則與飲食文學流行現象有關之外，行銷花蓮可能是附加價值。從這些徵文是否設有主題的變化，大抵可以看出主辦單位在設不設限之間的拉鋸，如果寫作者身分與主題全不設限，則有為人作嫁之嫌，設限則顯示自信不足。從得獎者的身分來看，大概境外與本地的寫作者皆有，所謂本地寫作者是包括在花蓮讀書、工作或暫時移居者，真正本地籍或長期定居花蓮的寫作者，仍然寥寥可數，這是令人憂心的現象。由於得獎的外地書寫者太多，花蓮文學獎另設新人獎與書寫原住民類，則可看出主辦單位對於向下紮根與凸顯花蓮人文特色的用心，期許豐厚花蓮文學的羽翼，走出與其他區域不同的特色。

歷屆花蓮文學獎得獎者中，有一部分寫作者的身分特別值得注目，他們是東華大學的在學學生，儼然成為花蓮文學的生力軍，日後成為文壇新秀者亦大有人在。顏崑陽在〈等待「花蓮」文學史〉一文中就已經預期東華大學、慈濟大學的設立，「必將吸引更多傑出文學作家移居花蓮」，⁹ 須文蔚¹⁰、張梅芳¹¹也都提到此一現象，邱貴芬更是毫不掩飾的讚美東華大學創立創作研究所帶來

9 顏崑陽，〈等待「花蓮」文學史〉，《花蓮文化》45-46期（合集），頁31。

的台灣文學新風景：

但這幾年來最令人驚豔的台灣文學風景發展，應屬東部花蓮地帶。東華大學創立之初，從台大借調到東華擔任英文系系主任的吳潛誠教授與當時文學院院長楊牧兩人在英文系籌設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大學資源與花蓮原有的在地文學資源互動密切，逐漸發展出台獨一無二，兼具文學創作與研究的花蓮山海文學生態，並成為台灣文學風景最尖端、最有活力、也深具在地意識與特色的新天地。¹²

東華大學的創作與英美語文學研究所是台灣第一個文學創作的研究所，頗吸引一批寫作的好手前來深造，加上學風自由與花蓮的戶外大教室（山、海與縱谷），這一新變化的確在文壇注入一股清新的活水，當然也擴大花蓮文學的風貌，不過，這些人在畢業後大多離開花蓮，對於花蓮文學的內在帶來什麼新變化尚待觀察。

花蓮因為誕生了兩位文壇經典作家特別令人矚目：小說家王禎和與詩人楊牧，中生代作家則有林宜濤、陳黎、廖鴻基、陳克華等人，也各擅勝場，並且持續吸引成名作家或長期或短期居留花蓮，如陳列、孟東籬、顏崑陽、王文進、李永平、須文蔚、吳明益、郝譽翔、凌性傑等人。在地域景觀上，太魯閣峽谷與中央山脈群山——奇萊山、木瓜山、能高山、加禮宛山，還有清水斷崖、花東縱谷、七星潭與東海岸的特殊地景，是其他地方所無，對於耳目、心

10 須文蔚，〈學院文學社群聚合下遷移者的花蓮書寫——以顏崑陽的散文與小說為例〉：「以花蓮文學近年來的發展言，大量作家遷移到花蓮的現象，實與學院的建置有關。無論是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國立東華大學、大漢技術學院、慈濟大學等高等學府的設置，不但引進在地的作家進入教學與研究的體系，更召喚了一批『遷移者』加入區域文學的創作與評論環境，豐富了花蓮文學的面貌。加上了國立東華大學設立了『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並且中國語文學系在發展上強調文學理論研究與現當代文學創作，更吸引了許多專注於創作的學子進入花蓮文學的場域中。」收在吳冠宏、須文蔚主編，《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在地與遷移》（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6.05），頁150。

11 張梅芳，〈花蓮新世代詩人群像〉：「花蓮除了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之外，東華大學從九〇年代末以來，逐漸成為花蓮新世代詩人重鎮，影響力不言可喻。學院的訓練吸引全各地創作者，一邊將身體置入海天遼闊的長養，一邊讓腦袋從單純的個人的封閉式思考，開啟和其他創作者的對話實驗。」收在陳黎主編，《第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3.03），頁110。

12 邱貴芬，〈台灣的中間，文學的中堅？談中部地區文學沿革〉，《自由電子報·自由副刊》（來源：<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l/25/life/article-1.htm>，2005.07.25）。

靈的震撼，激發出無限的想像與創意，讓人對花蓮文學較其他的區域文學有更多的期待。地方政府在本土化的浪潮下，為地方文學立史的企圖心，卻在撰述上遇到挫折，或許在思考花蓮文學史的問題之前，不妨先思考究竟什麼是花蓮文學？

二、花蓮文學的定義

（一）區域文學的意義

在試圖為花蓮文學定義之際，需先釐清幾個概念，區域、區域文化與區域文學間的關涉。一個區域邊界的產生究竟是由相關涉的主體認定，還是藉由國家的力量所強制劃定？在歷時性的過程中，區域邊界數度變化是常態，花蓮古稱崇爻、奇萊、洄瀾，與璞石閣（玉里）屬於不同的區域概念，且後者的開發先於花蓮，此時花蓮漢人人口少，區域範圍小，而且邊界是模糊的。日人治台後，花蓮最早是隸屬台南，後來曾經短暫隸屬於台東廳，至明治42年（1909）獨立為花蓮港廳，此後一直為獨立的行政區域。但是花蓮港街（花蓮市）與璞石閣（玉里）的歷史發展與族群屬性截然不同，卻同屬一個行政區域。因為花蓮是台灣土地面積最大、範圍最狹長的縣，長達137公里，跨越北回歸線，同時擁有熱帶與亞熱帶的氣候特徵，在地理景觀上有高山、海岸、縱谷、峽谷等非常殊異的地形，這些差異性非常大的地區，都被統稱為花蓮。因此我們很難從地理自然條件中找出它的同一性，形塑出一個區域特徵的花蓮，這是以行政區域劃分邊界所帶來的困擾。目前的區域文學史書寫通常以行政區劃分為依歸，所以會出現區域特徵不明顯，無法顯現地方文學的特色，應該以區域文化為界，強調區域文化所形成的特色與區域精神，這樣的區域文學史建構才有意義。

文學是作家觀照外在世界的方式，宇宙、自然影響作家，作家反映宇宙、自然，當作品被閱讀，隨即影響讀者，當讀者對宇宙、自然的反應因為閱讀文學作品而改變，¹³ 逐漸形成一個區域的人對於當地自然環境的觀感見解趨向

13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08），頁14。

一致，就建構出一個「區域文學」。區域文學的意義在於一般認為區域環境影響區域文學，並且形成一個文學傳統。客觀的地域風貌不僅作為觀照對象而存在，而且以其殊勝的方式培養作家的審美感受，尤其是兒童時期的記憶對主體的形構產生非常大的濡染作用，因此區域文學特別強調出生於本地的作家，原因就在此，不管日後本地作家落腳何處，總是無法將他排除於本地文學之外，從這個角度來看區域文學，林宜濤說：

的確，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可以稱為地方文學，因為每一個作者都有一個原鄉在推動他的寫作生命，那裡是他記憶的總匯，美感的泉源，世界雖大，但能與作者生命體驗緊密結合的，必定就是那塊，讓他魂牽夢縈的原鄉。¹⁴

可見故鄉／原鄉的地理、自然環境與人文活動是作家寫作重要的驅動力，楊牧曾坦言花蓮是他寫作的「秘密武器」的道理即在此。¹⁵

區域文學的理論基礎是自然環境不僅影響人類的生活方式與行為，甚至影響人的性格，最常見的說法是中國的南人北人不同論，例如劉師培說：「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¹⁶這樣的論述大體而言沒有錯，人必然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當大多數人受到此影響，常被誇大為地方特色，但是這樣的論述過於簡化而且有環境決定論的謬誤。事實上影響一地人民心性的因素眾多，即使同屬一地之人，性情也各異，貧富差距與價值觀亦有不同，很難以單一的地理環境來模塑。然而地理環境及其相應的生活條件與種族，形成當地特殊的語言、習俗，就是我

14 林宜濤，〈2010花蓮文學獎散文總評〉，吳進書總編輯，〈2010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花蓮紀念照〉（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0.10），頁121-122。

15 焦桐在〈台灣當代文學中的花蓮意識〉述及楊牧在一次返鄉演講公開他的創作秘密：花蓮的中央山脈、太平洋都是他創作的「秘密武器」。黃涵穎主編，〈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1998.06），頁126。此一說法廣為引述，另外陳穎，〈他是我們的秘密武器——側寫第四屆國家文藝獎得主楊牧〉則以楊牧的《昔我往矣》的〈秘密〉篇中的敘述為此說的論據，參見《東海岸評論》150期（2000.01），頁61。

16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劉申叔遺書》（中國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03），頁560。

們所謂的地方／區域文化，在無形中潛移默化人的性格、人生觀與審美觀等，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區域特性對區域文學的影響，可從兩者之間關鍵性的連結——區域文化——來論，但是顏崑陽認為區域文化與區域文學的關係是：「區域文化特性如何內化為文學經驗題材、主題類型及語言風格，因而營造出與其他區域不同性質的文學。」¹⁷由此可知，區域文化未必影響區域文學，而是必須經過內化而營造出與其他區域不同特性的文學才能稱為區域文學。

（二）廣義的花蓮文學

從最寬泛的定義來說，花蓮文學就是花蓮的文學，意指在花蓮一地產生、出版或是任何以花蓮及其相關事物為題材來書寫的文學作品。循著這個定義的精神，花蓮文學獎在徵文時並不限定寫作者的出生地、戶籍是否為花蓮，甚至第一次舉辦徵文時也不限定主題必須與花蓮有關，雖然後來的花蓮文學獎以與花蓮相關為題徵文，顏崑陽仍然強調：

我還是覺得花蓮文學獎，他的地區性，不管是歷史的、文化的、或是地理的，這樣的經驗厚度能夠進入到作品裡面，滲透到字裡行間去，不一定用一些概念化的地名，去標示出來，還是花蓮啊、玉里啊，不一定是這樣，但是你在閱讀的時候可以比較深層的在字裡行間感受到那種花蓮的歷史文化，那種花蓮的地理經驗能夠到裡面去，……。¹⁸

顏崑陽認為真正好的地方文學作品不一定要標示出地域的符號，在字裡行間滲透出花蓮的區域精神，就足以標識為花蓮文學。但是過於寬泛的定義下，在撰寫區域文學史時便會出現以下的狀況：一個作家一生遊走在數個縣市之間，於是他便會被放入兩個以上不同的區域文學史中。另一種狀況是如果相信花蓮已經內化到他的思想中，把他與本地完全無關的創作文本也納入討論，會

17 顏崑陽，〈講評〈台北：一個文學中心的形成〉〉，《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頁399。

18 黃淑文記錄，〈2004花蓮文學獎決審會議紀錄〉，吳淑姿總編輯，《2004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花蓮故事》（花蓮：花蓮縣政府，2004.11），頁122-123。

令人感覺存心沾光，若是以屬地主義的方式，只討論他與本地相關的作品，則又支解了作者寫作的延續性。¹⁹又或者恰好相反，其人只是匆匆行旅或完全未曾到過花蓮，當然也沒有任何花蓮生活、觀察的經驗，純粹是以花蓮的空間想像或符號化的書寫，這樣也可以納入花蓮文學嗎？事實上旅行文學與「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中有許多這樣的作品，以上的各種狀況對於區域文學史的撰述都是挑戰。

（三）狹義的花蓮文學

狹義的區域文學可定義為一種具有區域特性，受多數人所認同的文學傳統或文學書寫風格。也就是說花蓮文學必須形成一種特定風格或傳統，成為容易辨識指認的地方文學，而且這種地域特性的文學風格乃經歷長時間形成，穩定性高。龔鵬程分辨區域文學與文學傳統的關係說：「地域特性與文學傳統，非指自然地理區域中之一群人與一堆作品。這一群人與這一堆作品，若未顯示出一種共同創作趨向及風格特徵，便無法稱得上是文學傳統。」²⁰至於這種文學風格的書寫者，並非一定是此地出生的文人作家。從這個定義來看花蓮文學，花蓮文學的傳統似乎還沒有誕生，至少尚未達成共識，林宜濤說：

我們都很期待「花蓮文學」，但到目前為止，期待的心理大於實質的內涵，因為花蓮文學的現象和作品並不是那麼統一，個別作者之間的差異性蠻大的。譬如說王禎和與陳克華，或者是林滄鬱與陳黎，個別的差異都很大，所以我覺得不一定要急著去界定它。²¹

林宜濤心目中的「花蓮文學」是具有統一的風格或同一性的文學傳統，這就是狹義的區域文學，他認為目前的花蓮文學個別作者間的差異性很大，尚未凝聚出共相或共識，所謂的「花蓮文學」尚需時間等待成形。但是焦桐或許並

19 黃美娥，〈開啟台灣文學研究的另一扇窗〉，《文訊》174期（2000.04），頁50。

20 龔鵬程，〈區域特性與文學傳統〉，《聯合文學》8卷12期（1992.12），頁160。

21 賴秀美紀錄整理，〈花蓮作家看花蓮文學〉，《東海岸評論》131期（1999.06），頁57。

不這麼認為，他說：

懷舊，因此成為花蓮作家凝聚情感、建構花蓮意識的重要手段。

台灣當代文學中的花蓮意識是一種大規模的團結，書寫花蓮的作家通過對花蓮的情感和認同，通過想像和虛構，共享地方的自然風景和天災，在相對濃厚的人情中相互取暖，因為山水和人情而吸引蒼萃的人文，彼此激盪，建構出可觀的人文風景。花蓮意識，通過文本召喚了過去的記憶，並且一起懷抱對未來的希望。²²

依焦桐的說法，通過花蓮意識所共同建構出來的文本就是花蓮文學，而其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懷舊，懷舊的花蓮文學大概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出生於本地作家的懷鄉書寫，因此所思所寫是舊日的花蓮情懷；另一種是外地作家追懷在其鄉土已經逝去而花蓮仍存在的景物或生活方式，因此激發出鄉土情感而產生認同，這兩種花蓮意識都是投射式的書寫，鄉土經過轉化已經變成審美對象，意外的具有同一性，但是前者以記憶為基礎，後者則是建構出來的。

況且傳統是可以被發明的，²³ 花蓮意識也是被建構出來的，焦桐自己承認，所謂「花蓮意識」是他杜撰的，主要是以「地理特色形塑出來的，那是一種通過土地認同所發展出來的土地意識，不是族群意識。花蓮意識是虛構的，想像的，通過作家、特別是花蓮作家的文本產生出來。」²⁴ 這種虛構的花蓮意識也表現在區域精神上，陳黎說花蓮：「以其驕傲的山水，黏人的泥土，美善的人情融聚不同的族群，孕育出新的子民，形塑她包容開闊，樸拙清秀的獨特氣質。」²⁵ 陳黎所建構的花蓮精神，融合令人驕傲的大山大海、濃厚的土地情

22 焦桐，〈台灣當代文學中的花蓮意識〉，《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頁136。

23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認為：「創制『傳統』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出於人類刻意創造、建構而成；一種是在短時間內（或許只要三、五年）無形中形成。……『創制傳統』是一系列的實踐，通常是被公開或心照不宣的規定控制，具有儀式性或象徵性的本質。」參見霍布斯邦等著，《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09），頁11。

24 同註22，頁125。

25 陳黎，〈「洄瀾本土叢書」序：洄瀾之書，島嶼之愛〉，彭明輝，《歷史花蓮》（花蓮：花蓮洄瀾文教基金會，1995.09），頁3。

感與充滿美善的人格特質，²⁶這種看法與外地人所建構的「樂園」或「淨土」意象相去不遠。但是在陳克華眼中的花蓮卻是大相逕庭：

沒有人真正理解，花蓮其實是陳列筆下如假包換的「疫癘之地」。朋友間有人知道我是花蓮人的，總彷彿要撇清什麼似地說：「花蓮我有去過，花蓮真是好地方，空氣真好。」殊不知花蓮市籠罩在紙漿廠所排放的廢氣裡，已超過三十年了。昔日海岸上美絕的紅、白燈塔早已被炸毀不見，位於美崙山下優美恬靜的日本神社，數度改裝成混凝土動物充斥的半忠烈祠半神佛廟宇的怪物。花蓮火車站更是無視旅運吞吐量的失敗設計。在念花蓮高中時，親眼見到學校隔壁文化中心新落成的大廳尚未啟用即已大量漏水，……。我童年時期遍地好山好水的花蓮，正逐日被徐仁修先生所謂「貪官、汙吏、奸商、刁民」製造成另一個毫無特色、既庸俗又醜陋的典型台灣歷史失憶城鎮。是的，這是我所親眼所見所有台灣城鎮至今無一可以倖免的必然噩運。

所以二十年了，每一次「回家」之後，就越不想回家。回了家，就不想出門。不想遇見那些沉淪中的風景，萬劫不復的海灘，垃圾堆積而行道樹死光光的公路，由水泥和大理石草率而粗糙堆砌的一切一切景觀。²⁷

陳克華所描述的花蓮與淨土形象實在差異太大，兩者的差異來自背後意識不同。在「淨土」花蓮不可避免地顯像的貪官汙吏、奸商刁民，其實與台灣西部慘遭污染的小鄉鎮無異，陳克華以充滿憤恨的語言，露骨的諷刺：「於是我看見我體內揉雜著兩種衝突的血液／當南京街不著痕跡地從良／我成為一隻精蟲誤入的見證／那些善良清白的鄰家孩子喊我：／哈囉OK噯哩咕噯。／我總是溫柔地回答：／幹你老母駛你老母老雞巴。」²⁸ 陳克華的南京街小孩與

26 陳黎在〈尋求歷史的聲音〉也說：「花蓮的特質、花蓮的偉大是來自於它對不同族群的包容，這種包容是不知不覺、默默地在生活中進行的。」王威智編，《在想像與現實間走索：陳黎作品評論集》（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9.12），頁131。

27 陳克華，〈哀我花蓮〉，《夢中稿》（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公司，2004.01），頁40-41。

28 陳克華，〈南京街誌異〉，《我撿到一顆頭顱》（台北：漢光文化事業公司，1988.09），頁90。

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場景中歡迎美軍的酒吧女郎，是不同世代對同一事件的延續性觀察。至此，我們赫然發現所謂的「花蓮淨土」的真相，是由外來「他者」的凝視所定位，在外來發現者的眼中，「花蓮」是一個純淨、自然的國度，是沒有「人」的新天地。但事實絕非如此，在「人境」的花蓮，模仿台北、欽羨台北、拉攏台北，同時又拒斥台北，在現代化之下已經擺脫了傳統農業經濟網絡，舊的組織不再有約束力，舊的集體救濟系統也不再發揮功能，具有雙重的邊緣性格，²⁹給花蓮作家許多想像的空間，因此王禎和、林宜滙筆下的小人物，通常具有突梯滑稽甚至狡獪的性格，讓人愛憎交集，顯然與想像中不染塵埃的「花蓮人」很不同。透過花蓮意識所塑造的地方認同，不是一種集體「統一而真正的自我」，因為文化認同具有雙重性：一是類同和延續，另一則是差異和斷裂。³⁰由此看來，狹義的花蓮文學尋求具有共同意識的花蓮書寫以形成文學傳統，在雙重邊緣性格的花蓮，仍有待未來凝聚共識。

（四）地誌書寫的花蓮文學

不論是廣義或是狹義的花蓮文學定義都有其不足的地方，吳潛誠提出地誌書寫以尋求更圓融的花蓮文學的共識，他說：

「地誌」其實只是一個符號、標誌，是等待詮釋的。……地理現實是等待詩人／書寫者賦予意義，透過藝術的創作使它有形有狀，而顯示出意義。把花蓮、台東稱作後山，說台灣孤懸海外一隅，把某個地方叫北濱或南濱……這都是從特定立場所做的詮釋。……地誌詩篇具體的描寫地方景觀，它幫助我們認識、愛護、標榜、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風土景觀及其歷史，產生地域情感和認同，增進社區以至於族群的共同意識，而在地誌詩篇中，風景的每一條輪廓都隱含著社會及其文學。³¹

29 楊照，〈「現代化」的多重邊緣性格——論王禎和小說〉，《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頁17。

30 王浩威，〈地方文學與地方社群認同〉，《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頁19。

31 吳潛誠，〈地誌書寫，城鄉想像：楊牧與陳黎〉，《島嶼巡航：黑侏和台灣詩人的介入詩學》（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1999.11），頁80-83。

所謂的「地誌」(topography)乃是有關一個特定的地方與書寫，依吳潛誠的論述，地誌書寫中一定要有時間和空間的交錯，而地理空間是等待詮釋和賦予意義的，作家就是正在從事詮釋工作的人，所以與花蓮有關的地誌書寫都可以稱為花蓮文學，但是這樣解釋仍然太過空泛，所以他舉出必須包含以下三個特徵：1.描述對象以某個地方或區域為準，2.須包含若干具體事實的描繪，點染地方的特徵，而非書寫綜合一般性的印象，3.不必純粹為寫景而寫景，可加入詩人的沉思默想，包括對風土民情和人文歷史的回顧、展望和批判。³² 據此，地誌書寫不純然是地景的書寫，必須要有人的思考、感受在其中，而且越具體越好。施懿琳也強調區域文學：「欲突顯地域特色，最重要的是要能將該地的『土地』與『人民』的歷史記憶緊密結合，以呈現它之所以異於其它地區之處。」³³ 雖然施懿琳並非針對地誌書寫而言，兩人所論都指出關於特定地域文學書寫的重點在於空間書寫，但是空間書寫並不同於地理書寫，空間的意義是人賦予的，人在空間中辨識自我的存在，因此是人／族群與空間／土地透過互相滲透建構出一個地方的歷史、特色，有別於其他地方。陳義芝也認同花蓮文學就是地誌書寫，他說：

花蓮文學獎要求地誌書寫。地誌書寫除了區位、場所的指涉，最重要的是主觀情感的依附，地景帶給我們的人事悲歡，引領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展開生命的視野。……都可以從個人的視覺感官圖像變成眾人共話的心靈意象。³⁴

很顯然地誌書寫已經成為花蓮文學的共識，區域文學是以地方／空間為容器，廣納書寫文本以建構區域文學，書寫者以主觀的情感在空間中建立地方感，地方感來自於經常性活動的涉入，經由親密性及記憶的累積過程；經由意

32 同註31，頁83-84。

33 施懿琳，〈緒論〉，施懿琳、楊翠主編，《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05），頁4。

34 陳義芝，〈視覺形象到心靈意象——寫在花蓮文學新詩評審會後〉，吳淑姿總編輯，《2009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深情花蓮》（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9.10），頁122。

象、觀念與符號等意義的給予；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經驗或動人事件，以及對個體與社區／地方的認同感、安全感及關懷感的建立，才能對這個空間產生地方感。³⁵ 從地方感形成的過程來看，地方感並非一朝一夕即可達致，缺乏地方感的花蓮書寫，很難被視為花蓮文學。因此筆者以為花蓮文學的定義應該是：在文學語言的前提下，具有花蓮地方感的地誌書寫，即為花蓮文學。

三、花蓮文學史撰寫的難題

距離筆者參與的花蓮文學史料蒐集工作已經過了18年，這期間因為東華大學成立帶來許多新的變化，例如研究能量增強，並且吸收許多優秀的作家居停花蓮，產生許多優秀的文本，另外這十餘年來所舉辦的花蓮文學研討會與花蓮文學獎徵文，豐富了花蓮文學的內涵，在釐清花蓮文學的定義之後，或許可以重新思考花蓮文學史的編纂工作，以下是花蓮文學史撰述可能遇到的難題：

（一）歷史與意識形態

以有文字紀錄的歷史而言，花蓮的歷史相較於台灣西部要短很多，1875年清朝在「開山撫番」政策下從北、中、南三個方向開拓前往東部的道路，並引進漢人屯墾，但是成效不彰，漢人人口稀少，只有少數的據點依賴軍隊的保護，勉強維持，例如南方的璞石閣、水尾，在北方的花蓮（市）則引發加禮宛事件。1895年易幟到1909年花蓮獨立設廳之前，花蓮還是一個人煙稀少的蠻荒之地，廳治所在的花蓮港街（今花蓮市）於1910年實施都市計畫，所有現代化的設施陸續建設完成。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花蓮港街搖身一變成為擁有鐵道、發電廠、下水道設施、旅館、商店、料理店、公園、運動場、飛機場、高爾夫球場……等設施的現代城市，並且積極向日本國內與台灣本島招徠移民，是殖民者刻意建構的現代化示範區。從殖民者的視野來看，花蓮與日本的距離，比台灣西部到日本的距離還近，因此對漢人來說花蓮是後山的蠻荒之地，對日本

35 艾蘭·普瑞德（Allan Pred），〈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4），頁86。

人來說卻非如此。50年之後台灣主權易位，花蓮再次成為邊緣之地，在去日本化的政策下，關於日本殖民的記憶幾乎被洗刷殆盡，文學書寫的痕跡也不復存在。以有限的歷史來看，日治50年幾乎占了花蓮歷史的一半，這一半卻是空白的，因此談論花蓮文學，必須將這一段的空白重新恢復。對於文學傳統的建立來說，歷史的共同記憶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元素，去除日治時期的歷史記憶，等於去除花蓮人一半的共同記憶，花蓮人的歷史記憶只剩一半，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形成文學傳統毋寧是空談。

在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時，鍾淑敏的論文〈日治時期花蓮文學中的花蓮印象〉努力重建日治時期的日人花蓮書寫，第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時陳黎也提出〈日據時期花蓮日人短歌、俳句試譯／試探〉，繼續挖掘日治時期的文學書寫歷史，此前他已經與上田哲二合力翻譯《台灣四季：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此後又出版《紫潮：日據時期花蓮短歌、俳句選》，³⁶在日人文學歷史上深耕。在此之前我們以為花蓮最早的文學活動是1933年成立的奇萊吟社，³⁷殊不知在1919年就有日本人的俳句社團「大樹吟社」，甚至還有同仁刊物《潮》出版，島田謹二在《華麗島文學誌》中評價《潮》這本俳誌「所擁有的實力，在大正後期台灣俳壇佔第一位」，³⁸另有紫陽花歌會，出版歌集《豐秋》、《黎明》、《花蓮港俳句集》，靈魂人物為渡邊義孝與渡邊美鳥女夫婦，顯見花蓮在1920、30年代的詩歌風氣之盛。³⁹引述這段歷史的目的在於提醒，若不是鍾淑敏以及後來陳黎、上田哲二等人的挖掘，這段歷史不會出土。以往因為意識形態的緣故，往往排除日本人在台灣的文學活動痕跡，一如島田

36 陳黎與上田哲二合作翻譯的日人花蓮文學作品《台灣四季：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台北：二魚文化公司，2008.07）、《紫潮：日據時期花蓮短歌、俳句選》（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2.12），填補了日治時期花蓮文學的空白。

37 筆者在2001年5-6月發表於《國文天地》的〈花蓮地區的傳統文學（上）、（下）〉一文，根據所挖掘不夠完整的文獻《洄瀾同人集》推論，奇萊吟社應該成立於1933~1935年之間，此說廣為引用，後來發現一張奇萊吟社的紀念照，標註的時間是癸酉上元，換算成西元治是1933年，是駱香林剛移居花蓮的時候，因此可以確知奇萊吟社創始的時間定在1933年。

38 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日本東京：明治書院株式會社，1995.06），頁395。

39 陳黎，〈日據時期花蓮日人短歌、俳句試譯／試探〉，陳黎主編，《第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溯源與奔流——花蓮文學百年》（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2.03），頁206。

謹二在《華麗島文学—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中稱在台日人的文學為「外地文學」且排除台灣人的文學書寫一般，這種以種族意識形態排外的結果，造成區域文學的歷史與文學傳統斷裂。因此花蓮文學史無法忽視這段曾經存在的日人文學，可惜的是《東台灣新報》佚失，無法進一步窺見日治時期花蓮文學活動的盛況⁴⁰。除此之外是否有更多佚失的史料，則等待有心人的挖掘。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初期突然湧入大量的外省族群，當時流動率極高的情況下，究竟留下什麼文學痕跡？當時花蓮的兩大報刊《東台日報》⁴¹與《更生報》，肩負著去日本化與再中國化的使命，在意識形態下運作的文學書寫，究竟對花蓮文學產生了什麼作用？在解嚴之後，因為本土意識勃發，這段「再中國化」的文學書寫被湮沒在歷史之中，或許當時的文學書寫多為外來者，缺乏地方意識，或是文學水準不高而被忽略，但是文學史的撰述不可忽略這些發生過的歷史事實與幽微的影響，且這兩種完全不同語言的文學心靈，如何鏈接成為花蓮文學史，則考驗著撰史者的史觀。

台灣文學發展的歷史短暫，一向受到忽視的民間口傳文學可以拉長文學的歷史，陳萬益曾經建議區域文學以民間的口傳文學作為起點：「因為它屬於當地民眾的心聲，傳承了住民的思想、情感，承載了他們共同生活經驗。這和流動性較大的文人或作家比起來，『在地色彩』更形濃厚。」⁴²此議已廣為各縣市出版的區域文學史書寫者所接受。但是花蓮在1996年的文學史料蒐集工作，民間文學與原住民口傳文學的蒐集有限，十餘年過去了，漢人民間文學與故事除了洄瀾藝文叢書曾經出版李進益主編的《花蓮縣民間文學集》一、二集（2005年出版）與劉惠萍採錄的《花蓮客家民間文學集》（2009年出版）。原住民口傳故事的採錄則在原民會或國科會的補助之下，有了各族群版本的採錄，但是這些採錄的範圍以族群身分而非區域為限，是否能夠直接作為花蓮文

40 鍾淑敏，〈展現花蓮：作品、舞台與搭建者〉，許又方編，《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地方感·全球觀》（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9.12），頁169。

41 關於《東台日報》的整理研究可參考楊富閔，〈戰後初期（1945-1949）花蓮地區語文學活動之中國化現象：以《東台日報》為觀察場域〉，陳黎主編，《第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溯源與奔流——花蓮文學百年》，頁23-65。

42 陳萬益，〈現階段區域文學史撰述的意義和問題〉，《文訊》174期，頁35。

學之用顯然需要斟酌。這項建議也必須注意到花蓮歷史的獨特性（短暫性），花蓮的漢人都是來自於二次移民，移民先後雖有別，但差異不大，移民所攜帶的民間故事很多並非發生在花蓮，自然也無法顯現花蓮的歷史、人民情感與地方色彩，例如《花蓮客家民間文學集》僅有四則與當地歷史有關，分別講述〈水尾的由來〉、〈掃叭頂的傳說〉、〈玉里「客人城」的由來〉、〈玉里「大禹里」的由來〉，其餘皆講述中國神話與民間傳說或是與西部生活有關的故事，這是花蓮文學史欲採用民間文學的難處。

（二）在地與外來

花蓮數十年來人口幾乎沒有成長過，不斷吸引新的外來人口，卻也不斷的流失原有的住民，作家也是如此，有的短暫停留，也有離開又回來的，有的雖長期定居卻缺乏地方感，究竟怎樣的人所寫的才算是花蓮文學呢？例如陳義芝出生不久即離開花蓮，但是因為對於花蓮認同度高，有多首書寫花蓮的詩，並且長期參與花蓮文學獎的評審與花蓮文學研討會，所以被視為花蓮作家。反之，如李永平在東華大學任教，十餘年來生活於此，但是他的作品鮮少與花蓮有關連，在更早之前則有覃子豪、管管等詩人，也因工作因素短暫居停花蓮，卻鮮少被認為是花蓮詩人。這些現象可參考施懿琳對於地方文學的看法：

並不一定是人在此地，文寫此地，就有了「在地性」，有時也許適得其反；而「在地性」與「脫地方性」也可能有並存的矛盾，也必須納入並深刻剖析。無論如何，「在地性」，真正的指涉並非「人在此地」、「編輯此地藝文刊物」、「推動此地藝文活動」等表象上的行動，而應更深沉地探究其作品上的「土地意識」。⁴³

施懿琳所謂的「土地意識」類同於上一節所述的「花蓮意識」，是關愛這塊土地進而產生認同的地方意識。以此而論，則有幾種人難以被界定是否為花

43 施懿琳，〈緒論〉，《彰化縣文學發展史》，頁8。

蓮作家，首先就是東華大學的學生作家群。東華大學的創作與英美語文學研究所是國內第一個以文學創作為授課內容並且以創作取代畢業論文的研究所，中文系及華文系教師群亦不乏知名作家，頗吸引一些作家與年輕新秀前來深造，更重要的是培育了許多文壇的新生代寫作者，例如孫梓評、許榮哲、朱國珍、甘耀明、葉覓覓、何亭慧、王威智、廖律清、李儀婷、林達陽、魚果、劉亮延、甘子建、騷夏、楊澄靜、鄭聿、凌性傑、楊寒、王厚森……等人，這一長長的寫作隊伍還有增加的可能。⁴⁴ 這些年輕學子在生命中最具敏銳感受力、觀察力與學習力的時期來到花蓮，日日見山識水，花蓮的山水沁肌浹膚，即使作品中沒有隻字片言涉及花蓮的描述，是否就能排除與花蓮文學的關係？這些人的作品有的具有「在地性」而有的則具有「脫地方性」，不論如何都需要更深的探究，才能判定其區域文學的屬性與否。

另一族類則是短暫停留或是匆匆而過的旅行者的旅行文學，花蓮的太魯閣峽谷是國際級的自然景觀，吸引許多遊客前來觀覽，王彥在《花蓮文獻·花蓮詩選》中選錄許多古典詩人如溥心畬、陳定山、賓國振等古典詩壇大老的詩作，都是因為遊太魯閣接受駱香林、王彥的接待而成為朋友，彼此間的詩歌唱和是古典詩壇常態，這些詩作對於作者個人而言可能有意義，對於花蓮文學而言是否增光生色，尚待撰史者檢視。除此之外，許多關於花蓮的旅行文學散布在作家的個人文集或期刊、雜誌中，蒐集史料猶如披沙揀金，而其作品的地方色彩或許是帶著獵奇心態、或是觀光客的投射心理，是否具有地方意識亦令人存疑，這樣的作品能否列入花蓮文學？

花蓮文學獎的徵文舉辦多年，吸引許多外地寫作好手，憑藉著旅遊花蓮的記憶，寫出動人的文章，但是其中也有「獎金獵人」的作品，⁴⁵ 刻意揣摩著評審的文學品味，寫出似真若假的花蓮文學，須文蔚針對2011年花蓮文學獎新詩徵文結果總評說：「由於多數的作品都為寫景而寫景，少了詩人的反省、思

44 張梅芳，〈花蓮新世代詩人群像〉，陳黎主編，《第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溯源與奔流——花蓮文學百年》，頁82-84。

45 所謂獎金獵人是指具有相當程度的文學寫作者，以獵取獎金為目標，到處參加文學獎的人，由於地方文學獎通常要求書寫與地方相關的事物或地理特色，獎金獵人往往透過歷史知識與到此一遊，編造「具有地方特色」假象的文學書寫。

考或批判，甚至沒有進入風土民情中，使得大半的作品少了情感與動人的元素。」⁴⁶事實上這也是歷屆徵文作品的普遍現象，至此，花蓮文學獎與花蓮文學的關聯性也必須被仔細檢驗。綜合而言，並非外來者就不能列入花蓮文學，也不是久居者所寫就一定是花蓮文學，地方感或土地意識才是檢驗的依據。

（三）在地化與全球化

花蓮一向被視為邊緣、蠻荒之地，花蓮人對於權力中心的台北既靠攏又抗拒，世居者欣羨、仰慕台北的文明、進步，模仿台北的一切，期待花蓮的進步。但是因為山脈的阻隔，讓花蓮的建設緩慢、落後，保留了原始、樸實的一面，吸引了一些厭棄都市文明的人，懷抱著尋找桃花源的梦想來到花蓮，抗拒著台北的文明來「汙染」這個桃花源，⁴⁷尤其是文學的書寫中，這種「抵中心」的論述俯拾皆得。因為山脈的阻隔（空間因素）與文明落後（時間因素），造就花蓮與台灣西部不同的區域特色，也造就花蓮文學的特色。在現代化加速了移動的特性下，空間的距離逐漸被泯除，尤其在電子化時代，無國界的文化已經傳播全世界，全世界成為文化霸權的電子殖民地，花蓮的區域特色是否還存在？泯除了區域特色，花蓮文學還是花蓮文學嗎？

懷鄉或懷抱尋找桃花源的作者，抒情與寫實的文學表現方式是最常見的，但是對於成長於電子媒體影響無所不在的新生代作家而言，純粹的寫實技法已經被揚棄，批判性也很少在詩中被觸及，張梅芳觀察到：「在新世代的視野裡，呈現較少被言語觸及的現狀，現實成為生活中瑣碎拼貼的物件，大歷史、大敘述、大角度從新世代的切面中沉沒消失。」⁴⁸顯然這樣的書寫語言風格受到後現代電子影像的零碎化、片面化的影響有關，因此很少在新世代詩人的詩中找到直接指涉地方性的敘述方式，不免令人焦慮地方性是否已經在新生代花

46 須文蔚，〈2011花蓮文學獎新詩總評〉，吳進書總編輯，〈2011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1.11），頁101。

47 以上兩種心態在蘇花高速公路興建的議題上被激化出來，世居者大多贊成興建，新移民則多數持反對意見，以環保為優先。關於這兩種意識可參見顏崑陽，〈「後山意識」的結構及其在花蓮地方社會文化發展上的異向作用與調和〉，《淡江中文學報》15期（2006.12），頁117-152。

48 同註44，頁87。

蓮作家作品中遭到抹除。

在全球化的威脅下，千人同面，眾人一詞的流行文化已經逐漸抹除地方特色，鮑曼（Zygmunt Bauman）說：「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處於本土化，這是被社會剝奪和貶黜的標誌。由於公共空間的消除超越了本土化生活的所及，本土正在消卻其意義生成和意義轉讓的能力。」⁴⁹ 也就是說本土賦予意義的權力已經遭到剝奪，具有「本土色彩」已經形同貶詞。但是花蓮作家的流動性更強，世界性也更強，花蓮作家相信，在地化／本土化與全球化不是互斥的，反而在全球化之下，本土的特色更容易被看見，陳黎曾經說過：「我從上大學以來開始寫詩，一直到現在，我發現自己的寫作，有兩個非常明顯的傾向：一種是現代化的、前衛的、國際性格的，另外一種是本土的、歷史的或是生活的。……但不論我自己的創作是怎樣地擺盪變動，我發現在骨子裡，有一種立足島嶼邊緣，可是又可以放眼整個天下的兼容並蓄的特質。」⁵⁰ 的確陳黎在近年來不排斥走出去，與世界各地作家交流，可以視為花蓮作家全球化的指標。這樣的認知並非單獨現象，林宜濤也說過：「在當今全球化的浪潮下，越在地化往往就越能全球化，同樣地，我們越深化我們的原鄉記憶，我們的作品就越有機會能觸及超越的普遍性，而達到最大可能的高度。」⁵¹ 說穿了，地方性的文學作品從區域的特殊性出發，抵達文學普遍性的終點，分享人類的喜怒哀樂的情感共通點，透過無國界的傳播，區域不是限制的疆界。楊翠分析花蓮文學獎的意義說：「在文化多元性的脈絡中，以文學彰顯『地方文化特色』，一方面具有向外分享的開放性意義，二方面具有向內凝聚的激進性意義；標舉『在地文學』並非封閉、保守、排它，而是確認一個觀看世界的位置。」⁵² 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特別標舉地方感與全球觀，許又方認為這是企圖「由花蓮出

49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著，郭國良、徐建華譯，《全球化——人類的後果》（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頁2。

50 陳黎，〈尋求歷史的聲音〉，王威智編，《在想像與現實間走索：陳黎作品評論集》，頁121。

51 林宜濤，〈2010花蓮文學獎散文總評〉，吳進書總編輯，《2010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花蓮紀念照》（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0.10），頁121。

52 楊翠，〈為「地方」塑像——以「花蓮文學獎」為論述場域〉，陳黎主編，《第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頁368。

發，聯繫整個世界；或是從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凝視、想像福爾摩沙東岸的洄瀾山海。」⁵³ 他們都已經注意到全球化現象既聯合又分化的特性，對某些人來說是全球化的東西，對另一些人來說則意味著本土化，對某些人全球化標誌著一種新的自由，對某些人而言則是殘酷的飛來橫禍。⁵⁴ 在這個看似二元對立的分化狀態中，去中心、無家可歸或自我放逐的現代作家，與花蓮將擦撞出怎樣的火花？花蓮文學將產生什麼變貌？如何面對全球化對本土化的衝擊是花蓮文學史撰述者的新課題。

四、結論

1996年筆者有幸參與花蓮文學史料的蒐集工作，在古典文學方面收穫甚多，此後一直以此為研究範圍，眼見各地的區域文學史開花結果，雖然心生羨慕，但是花蓮縣文化局十餘年來的努力也是有目共睹，除了持續的辦理「花蓮文學研討會」，挖掘更多的文學史料與深化文學史料的價值，也開辦「花蓮文學獎」的徵文，擴大花蓮文學的範圍，用以培育在地年輕書寫者，強化地方認同，等待羽翼日豐。至於洄瀾藝文叢書獎勵、補助地方文史的書寫，也有助於找回花蓮人的歷史記憶，還有鼓勵地方型的創作者，朝向全國性的創作者邁進。這些成績歷歷可考，收穫豐盛，花蓮文學史的出版，相信也為期不遠了。

在撰述花蓮文學史之前，必須先釐清花蓮文學的定義，若從廣義來看，以區域為容器，只要是花蓮人或是居住於花蓮、又或者以花蓮為題材的創作，都可以算是花蓮文學的話，未免過於寬泛。若以狹義的花蓮文學而論，花蓮的歷史太短，要求形成文學傳統的花蓮文學要求太嚴苛，不但不易達成，而且將排除許多優秀作家作品。花蓮文學之所以被肯定，先是花蓮籍的作家如楊牧、王禎和、林宜濤、陳黎、廖鴻基、陳克華等在文壇備受肯定，讓人好奇何以花蓮的作家密度與成就如此之高，必定有什麼「祕密武器」才能培養出如此眾多的優秀作家，花蓮的高山、大海、峽谷與縱谷風情，是花蓮與其他地方不同的地

53 許又方，〈序〉，《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

54 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著，郭國良、徐建華譯，《全球化——人類的後果》，頁2。

理／空間優勢，其影響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當楊牧道出「花蓮是他創作的秘密武器」時，大家更是深信花蓮的區域特色與花蓮文學的關聯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外地移入作家有許多是懷抱著尋找桃花源淨土的意識前來，因此花蓮的山水更成為花蓮文學的象徵意涵。但是，山水被符號化之後反而窄化了花蓮文學的意涵，這是一個警訊——花蓮文學絕不僅止於山水文學。筆者認為具有地方感的地誌書寫，才能成為花蓮文學，所謂地方感必須與地方的事物、地景經過長期的互動，互相融涉並且賦予意義，才能把空間轉化為地方。事實上這種地方感必須投身成為大地之上的棲居者，築造出「家」的安定感與安全感，地方才能成為情感投注的對象。

確定花蓮文學的定義，等於劃定花蓮文學的邊界，自可將其餘不相關的文學排除在外，但是疆界自有其模糊地帶，因此仍需仔細審定，撰述花蓮文學史難免要碰上一些問題。花蓮的歷史甚短，日治時期的歷史在以往去日本化的意識形態下被排除，如何彌補、銜接，則考驗著撰史者的語文能力與史觀，而政權交接之際的文學活動，兩大地方報——《東台日報》與《更生報》以外稿居多，且充斥著教條與意識形態的宣教，偶爾也混雜著本土作家的創作，等待有心人的爬梳史料。兩種極端的文學書寫，如何兼容並納？由此可知，文學史中的一項重要因素——時間，對花蓮文學而言，可能成為致命的缺點，許多文學作品尚未經過時間的淘洗，徒具歷史意義而未見文學價值。而文化的斷裂，歷史的失憶，造成區域文學的片面化、窄化，如何重建也是一大工程。

花蓮文學的另一個問題是流動性太快，移居作家的地方感尚未建立就離開了，或是觀光客遊觀式的旅行文學，在缺乏文本下經常被納入花蓮文學的範疇來討論。另一種流動則是來自於全球化，電子媒介消除了空間障礙，地方感崩解、消失與歷史脫節，在這種快速流動的節奏下，雖有助於地方的競爭力，越特殊、越稀有就越容易被看見。但是傳統文化和地方身分常常以商品化、市場化來保存，或再生產為簡化的意象、擬象、拼貼來展覽行銷，最終反而可能導致地區獨特性意義的流失，⁵⁵ 也就是說花蓮文學的優勢，正在一點一滴的流

55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9），頁23。

失。此外，雖然因為東華大學的設立培育眾多新世代作家，但是這些作家在學成後離開，作品是否可以納入花蓮文學，仍有待時間驗證。

花蓮文學史涵蓋空間和時間兩項要素，空間跟歷史一樣，不是靜態的，而是持續的建構，花蓮文學，是現在進行式。



參考資料

一、專書

文訊雜誌社主編，《鄉土與文學：台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實錄》（台北：文訊雜誌社，1994.03）。

王威智編，《在想像與現實間走索：陳黎作品評論集》（台北：書林出版公司，1999.12）。

花蓮縣立文化中心編，《第一屆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1999.06）。

花蓮縣文化局主編，《2003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愛上花蓮的理由》（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3.07）。

吳淑姿總編輯，《2004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花蓮故事》（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4.11）。

花蓮縣文化局主編，《2005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書寫花蓮》（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5.11）。

——，〈《2006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給花蓮的戀人絮語》〉（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6.11）。

——，〈《2007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生活在花蓮》〉（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7.10）。

——，〈《2008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想像花蓮》〉（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8.10）。

——，〈《2009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深情花蓮》〉（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9.10）。

吳進書總編輯，《2010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花蓮紀念照》（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0.10）。

——，〈《2011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1.11）。

陳淑美總編輯，《2012花蓮文學獎得獎作品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2.12）。

黃涵穎主編，《第一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1998.06）。

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執行小組編輯，《第二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地誌書寫與城鄉想像》（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0）。

- 吳冠宏、須文蔚主編，《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在地與遷移》（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6.06）。
- 賴芳伶、須文蔚主編，《第四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區域·語言·多元書寫》（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8.03）。
- 許又方主編，《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地方感·全球觀》（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9.12）。
- 陳黎主編，《第六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論文集：溯源與奔流——花蓮文學百年》（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2.03）。
- 陳黎、上田哲二合譯，《台灣四季：日據時期台灣短歌選》（台北：二魚文化事業公司，2008.07）。
- ，《紫潮：日據時期花蓮短歌、俳句選》（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12.12）。
- 陳克華，《夢中稿》（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公司，2004.01）。
- ，《我撿到一顆頭顱》（台北：漢光文化事業公司，1988.09）。
- 彭明輝，《歷史花蓮》（花蓮：花蓮洄瀾文教基金會，1995.09）。
- 吳潛誠，《島嶼巡航：黑侏和台灣詩人的介入詩學》（台北：立緒文化事業公司，1999.11）。
- 施懿琳、楊翠，《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05）。
- 張家菁，《一個城市的誕生：花蓮市街的形成與發展》（花蓮：花蓮縣文化局，1996.09）。
- 劉惠萍，《花蓮客家民間文學集》（花蓮：花蓮縣文化局，2009.05）。
-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中國南京：鳳凰出版社，1997.03）。
-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著，《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09）。
-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4）。
- 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学—日本詩人の台湾体験—》（日本東京：明治書院株式會社，1995.06）。
-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9）。
- 劉若愚著，杜國清譯，《中國文學理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08）。
- （英）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著，郭國良、徐建華譯，《全球化——人類的後果》（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王文進，〈花蓮文學與花蓮作家〉，《東海岸評論》131期（1999.06），頁55-56。

陳萬益，〈現階段區域文學史撰述的意義和問題〉，《文訊》174期（2000.04），頁31-36。

陳穎，〈他是我們的秘密武器——側寫第四屆國家文藝獎得主楊牧〉，《東海岸評論》150期（2000.01）。

黃美娥，〈開啟台灣文學研究的另一扇窗〉，《文訊》174期（2000.04），頁48-50。

賴秀美紀錄整理，〈花蓮作家看花蓮文學〉，《東海岸評論》131期（1999.06），頁57-61。

顏崑陽，〈等待「花蓮」文學史——花蓮文學史資料蒐編始末〉，《花蓮文化》45-46（合集），（1997.12），頁26-31。

——，〈「後山意識」的結構及其在花蓮地方社會文化發展上的異向作用與調和〉，《淡江中文學報》15期（2006.12），頁117-152。

龔鵬程，〈區域特性與文學傳統〉，《聯合文學》，8卷12期（1992.12），頁158-174。

三、電子媒體

邱貴芬，〈台灣的中間，文學的中堅？談中部地區文學沿革〉，《自由時報·自由副刊》（<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jul/25/life/article-1.htm>，2005.07.25）。

